

从兴盛到衰败

近代中国民信局（1866—1934）

徐建国 著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术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术文库

从兴盛到衰败

近代中国民信局

(1866—1894)

徐建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兴盛到衰败：近代中国民信局：1866—1934 / 徐建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6

ISBN 978 - 7 - 5203 - 0345 - 3

I. ①从… II. ①徐… III. ①邮政—经济史—史料—中国—1866 - 1934
IV. ①F63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991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学术史回顾	(1)
一 选题缘由	(1)
二 学术史回顾	(2)
第二节 研究对象、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10)
一 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10)
二 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16)
第三节 时间断限、资料说明及学术贡献	(17)
一 时间断限	(17)
二 资料说明	(18)
三 学术贡献	(20)
第二章 民信局的兴起	(22)
第一节 古代社会的信息沟通	(22)
第二节 关于民信局产生的三种说法	(24)
第三节 民信局产生的经济环境	(30)
一 明清时期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	(30)
二 明清时期商人经商范围的扩大	(34)
第四节 民信局兴起的历史进程	(37)
第三章 晚清时期的民信局	(42)
第一节 晚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概况	(42)
一 全国各主要经济区域的完全形成	(42)
二 各区域间商品流通的频繁	(59)

第二节 晚清时期民信局的发展概况	(65)
一 长江沿线地区	(66)
二 东部沿海地区	(81)
三 其他地区	(92)
四 关于晚清时期民信局的数量和分布地点问题	(93)
第三节 晚清时期民信局的寄递网络研究	(98)
一 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分析	(98)
二 民信局的寄递网络分析	(111)
第四节 晚清时期民信局寄递网络 and 商品流通网络之间的 关系	(120)
一 信息沟通对商品流通的促进作用	(120)
二 商品流通网络是民信局寄递网络展开的基础	(124)
 第四章 民信局的组织和经营	(143)
第一节 民信局的组织和运营概况	(143)
一 民信局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144)
二 民信局的邮递方式	(156)
三 民信局的资本额	(166)
四 民信局的经营方式	(171)
五 信业公所与民信局	(179)
第二节 民信局的经营理念 and 经营特色	(188)
一 民信局的业务范围广	(188)
二 民信局注重服务中的细节	(191)
三 民信局的资费低廉	(199)
四 民信局的低成本运营模式	(201)
第三节 民信局存在的弊端	(205)
一 民信局经营线路的选择性	(205)
二 民信局从业者的不轨行为	(209)
三 民信局之间的无序竞争性	(217)
四 对相关从业者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	(223)
五 民信业缺乏有效的赔偿机制及抵御风险的能力	(230)

第五章 民间信局和官办邮政之间的博弈·····	(237)
第一节 民间信局和官办邮政的相互竞争时期(1896—1911)·····	(238)
一 官办邮政对民间信局进行排挤和竞争的具体措施·····	(238)
二 民信局的抗争和初步萎缩·····	(272)
第二节 民间信局和官办邮政的一退一进时期(1912—1934)·····	(287)
一 官办邮政对民间信局进行打击和竞争的具体措施·····	(287)
二 民信局的完全衰落及最终被取缔·····	(306)
第六章 结语·····	(323)
第一节 民信局的兴起与发展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 结果·····	(323)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325)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意志·····	(327)
参考文献·····	(332)
后记·····	(340)

第一章

导 论

本章主要说明选题缘由，过去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研究的创新点及所要阐述的学术问题，而且对所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况也做一简单介绍。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学术史回顾

一 选题缘由

在传统社会的信息传递中，除官营的驿站外，民信局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关于驿站制度的研究处于主流地位，缺乏对民信业全面系统的研究。按照目前关于民信局研究的唯一一本专著的说法：“民信局是中国民间非常特殊的行业，不过国人研究者不多，也甚简略”，“民信局服务民间的历史颇长，对民间书信及财货的流通贡献至巨。只是对于此一行业渊源、组织、发展、业务及贡献的探讨，并不多见”。^①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关于信息沟通在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人们也有所认识，但在提到信息沟通方式时，却忽视了民信局所起到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通信形式，在近代官办邮政普遍设立之前，民信局对于沟通商业信息、促进亲情友情交流，都起到极大的作用，值得详加剖析。另外，关于民信局产生的原因，各种材料及研究文章都强调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但在有

^① 彭瀛添：《民信局发展史——中国的民间通讯事业》，（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2页，正文第2页。

关经济史或商业史研究的文章或专著中，却很少提及民信局。由于缺乏对这种民营服务行业的系统研究，人们对在前近代尤其是近代以来极大地促进商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民间通信形式缺乏深刻认识。对于民信局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应该做出客观的评价，仅从这一点讲，也有研究之必要。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原始资料缺乏，在目前关于民信业已经进行的相关研究中，不但专著和文章有限，而且还存在互相因袭的情况，以致有些本来就没有根据的说法被沿袭下来，长期没有得到纠正；有些问题则表达不清，从而造成人们对民信业的种种不实甚至错误的认识。

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挖掘史料：一方面从较为微观的层面概述晚清时期民信局处于鼎盛时期的状况、民信局的组织和经营状况及经营特色与存在的弊端，纠正过去关于民信业的某些不实或不确说法和结论；另一方面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民信局寄递网络和商品流通网络之间的关系、民信局和官办邮政之间的博弈状况，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求使人们能够对这一近代重要的民间通信形式有更为明晰的认识。

二 学术史回顾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存在过的一种重要民间通信形式，要对民信局研究作系统的学术史回顾，就不能不首先提到近代邮政的研究状况。近代邮政制度是随着西方的入侵而移植到中国来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近代邮政研究也是一个比较薄弱的课题：一是各地虽然以省市为单位编写了邮政志或邮电志，但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经概述了当地邮政或邮电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的是其历时性的一面，而且其中许多著作的质量水平不高；二是缺乏一部有力度、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近代邮政史著作。现在所见到的唯一一本以近代邮电史命名的著作是《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是为邮电系统职工了解近代邮电发展状况而编写的通俗普及读物，学术性不强，正如编者所说，是“为了使邮电职工尤其是新入局的职工能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邮电事业的历史”而编写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该书出版在30多年前，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其中有些观点需要重新审视，有些史实需要根据已经发现的史料加以补充和纠正。

但该书的开创性在于它比较简略地讲述了近代中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该书对于从事这方面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近年来，有一些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纷纷选择近代邮政作为论文题目，写出了一批学位论文，但主要限于硕士研究生，就目前查阅到的论文看，尚没有博士生将近代邮政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关于这部分学位论文，有的从全国范围角度，有的从地方邮政发展角度。《近代中国邮政统一与发展研究》概述了全国邮政统一的历程及近代邮政的发展，认为近代邮政的统一与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传播、便利了民众生活，指出近代中国邮政具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相对落后性的特点^①；《晚清中国邮政的近代化》概述了古代邮驿的状况、近代邮政的产生以及组织管理状况，认为从西方引进的邮政制度对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推动了中国邮政的近代化进程。^②另外，有论文从制度经济学视角论述了近代邮政的发展。《制度、运作与效应：清末国家邮政事业述论》论述了晚清时期邮政的建立和发展、运营状况以及邮政与民信局、客邮和驿站之间的竞争情况，认为国家邮政的建立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变迁。^③有的论文则从邮政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展开论述。《邮政与中国近代社会——以山西为中心（1896—1937）》概述了近代中国邮政的建立及邮政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认为近代邮政制度的建立使人们可以通过邮政表达其诉求，从而构建起开放的社会体系。^④有学位论文论述了晚清邮政与财政之间的关系。《晚清邮政与财政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晚清财政危机导致了邮政开办，财政的窘困又制约了邮政的发展，因而造成邮政权委诸外人、邮路拓展不平衡的现象。但晚清邮政建立的积极作用在于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也有利于邮权统一。^⑤有学位论文论述了海关邮政。《试论晚清的海关邮政》概述了海关邮政开办前的中国邮政状况、海关控制

① 参见胡婷《近代中国邮政统一与发展研究（1896—1937）》，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06年。

② 参见崔红欣《晚清中国邮政的近代化》，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

③ 参见尹学梅《制度、运作与效应：清末国家邮政事业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5年。

④ 参见田明《邮政与中国近代社会——以山西为中心（1896—1937）》，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5年。

⑤ 参见丁国花《晚清邮政与财政的关系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

邮政的过程、海关管理邮政等内容，分析了海关邮政的特点和影响，认为海关邮政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产物，促进了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① 还有部分学位论文从区域角度论述了近代邮政的发展状况。《苏中邮电事业早期现代化进程（19世纪末—1949年）》概述了苏中地区的邮电事业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认为晚清时期建立起来的近代苏中邮电体系是苏中邮电通信方式向现代通信方式、技术的过渡。^② 《天津近代邮政的产生及其发展研究（1878—1928）》概述了天津近代邮政产生的背景、天津邮政机构的变化及邮路建设、天津邮政的发展，并分析了邮政发展的原因和影响。^③ 《1911—1928年福建邮政的发展》概述了福建邮政在1911—1928年的发展状况、邮政与客邮和民信局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福建邮政发展的原因和局限性。^④ 从总体上看，以上这些学位论文普遍存在史料堆积和罗列现象，分析缺乏深度和广度。

关于近代邮政研究的文章数量有限。《徐世昌与近代中国邮政》一文论述了徐世昌在邮传部尚书任内为邮政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一是兴办邮政学堂；二是选派学生赴奥学习邮政；三是借鉴西方经验，建立邮政机构和各项制度。^⑤ 《中国近代邮政的经营管理述论（1896—1936）》论述了近代邮政的兴起和发展、管理制度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业务经营等问题，并简略分析了制约近代邮政经营管理成效的其他因素。^⑥ 《从海关档看中国邮政之肇基——以赫德所颁1—10号邮令为例》认为中国近代邮政萌发于1866年海关兼办的寄递外国文件，海关对其发端、成长直至确立，具有引导、扶助及推进作用。^⑦ 《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认

① 参见于越《试论晚清的海关邮政》，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6年。

② 参见顾臻伟《苏中邮电事业早期现代化进程（19世纪末—1949年）》，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7年。

③ 参见肖晓虹《天津近代邮政的产生及其发展研究（1878—1928）》，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④ 参见胡中升《1911—1928年福建邮政的发展》，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6年。

⑤ 参见傅贵九《徐世昌与近代中国邮政》，《学术月刊》1990年第11期。

⑥ 参见徐卫国《中国近代邮政的经营管理述论（1896—1936）》，载刘兰兮主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⑦ 参见吴弘明《从海关档看中国邮政之肇基——以赫德所颁第1—10号邮令为例》，《历史教学》2006年第6期。

为邮政官局在控制、排挤和取缔民信局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有所改进,推动了邮政的近代化。^①《赫德与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确立和初步发展》一文认为赫德采取了总体上缓进的策略,并且取得清廷的正式批准及各级官府对邮政的支持、恰当处理与其他邮递形式之间的关系、学习借鉴民信局的经验教训、加强邮政的制度建设、利用海关资金支持邮政发展等措施,使移植自西方的新式邮政体制建立起来,实现了由旧式邮政向新式邮政的彻底转变。^②以上文章大部分都强调了海关与近代邮政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表明海关对于近代邮政制度的确立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关于近代邮政史的研究十分薄弱,普遍存在低层次、低水准、资料征引范围狭窄的缺陷,需要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来填补空白。在近代邮政史研究中,有时也会提到民信局,但都是在论述近代邮递系统的混乱状况时简略提及,基本上把民信局视为官邮在实现邮政垄断权的过程中排挤和打击的对象看待,对于民信局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鲜有论及。其实,民信局不只是官邮排挤和打击的对象,同时也是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民信局的竞争促进了官邮的发展,官邮的网点普及和邮路的开辟及延伸、服务项目的增加和改进等,都建立在与民信局竞争的基础上。

关于近代邮政史的研究已属薄弱,关于民信局的研究则更加薄弱,有许多人对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过的这种重要的民间通信形式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即使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对民信局的经营、组织、业务等情况也了解不多,“对局外人来说,这永远是一个谜:这些机构是如何作账和检查它们下属机构的业务活动”^③。其实,民信业研究早就引起人们的兴趣,1928年出版的《中国邮电航空史》一书中有专门的《信局》一节,较为简略地对民信局的由来、发展及当时的状况做了宏观描述。作者在当时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提出研究民信局的价值是“外人动讥吾国人民无组织能力、无自治能力,盖未洞悉吾国社会情状也。故

① 参见胡婷《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徐建国《赫德与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确立和初步发展》,《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0期。

③ 秦惠中主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详陈各地信局状况于下，以证其说之诬”。^① 其他像楼祖诒所著的《中国邮驿发达史》等专著中也略有提及。但他们都采用概述的形式，非常简略，无法形成人们对民信局的系统认识。

1949年以后，民信业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不多。《民信局兴亡简史》是比较早的一篇文章，但主要是介绍性质，论述了民信局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民信局的业务经营情况以及民信局设立过多的弊端，认为民信局被官邮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② 《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一文认为从1866年海关兼理邮政开始到1911年间，双方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866年至1895年，两者之间尚未发生利益冲突，海关邮政对民信局采取竞争、利用并举，以利用为主的做法；从1896年到1905年，官局与民局发生利益冲突，在两者竞争日趋激烈的基础上，官邮对民信局采取利用、限制、排挤，以控制为主的做法；从1906年到1911年，随着官邮势力的不断增强，对民信局采取了控制、排挤，以排挤为主的做法。^③ 《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分析》从民信局的网络结构、寄递地点和范围、数量、业务量等方面分析了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结构，认为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呈现出通信网络的稀疏性、寄递线路的选择性、寄递地点的有限性和同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性等特点。^④ 《近代民信局的寄递网络研究》通过对民信局寄递地点和范围的分析，认为民信局的寄递网络主要呈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城镇三个层级展开；各区域中心城市民信局的寄递网络展开的特点不同；民信局的寄递网络说明在区域内部经济联系密切的基础上，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已经突破了内部束缚，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表征；民信局的寄递网络以沿海沿江一线为主干，体现出了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⑤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认为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

① 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8页。

② 参见黄鉴晖《民信局兴亡简史》，《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

③ 参见黄福才《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参见徐建国《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参见徐建国《近代民信局的寄递网络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

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官邮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这是官邮利用国家强制力实现行政垄断的结果。^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民信局研究的唯一一本专著是《民信局发展史——中国的民间通讯事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有必要对它做较为详细的介绍。第一章“导论”论述了中国驿政的演进和客邮的发展状况；第二章“民信局的缘起”分民信局和批信局两部分，论述了其产生的原因；第三章“民信局的发展”也是分为两部分，论述了其发展及分布状况；第四章“民信局的贡献”同样是分两部分，论述了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方便民众的贡献；第五章“民信局的取缔”依然是分两部分，论述了民信局被取缔以及批信局的延续。本书从较为宏观的高度和视角研究了民信局和侨批局的发展历程，但缺乏对民信局的组织和经营状况、民信局的信息沟通和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民信局和官办邮局之间的博弈而体现出来的民信局的衰落过程等问题的微观论述。

除了民信局研究外，对侨批局的研究状况也需要做出说明，这是因为在进行民信业研究时，一直把侨批局视为民信局的分支，在关于两者关系的认识上，一直含混不清。《民信局与侨批局关系考辨》一文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认为两者在起源、寄递范围、经营项目、资本额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两者达到鼎盛时期的时间段也不一致，把两者放在一起研究，容易产生混淆，如果把两者区别开来并进行比较研究，当更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②从总体上看，由于侨批业所具有的特殊性，研究成果较多，按照时间段大致可分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民国时期的侨批业研究即取得丰硕成果，其中高质量的专著当属《福建华侨汇款》和《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前者主要论述了福建侨汇的数额、汇款者的组成、侨汇的用途、侨汇对福建侨乡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的影响、侨汇机构与侨汇手续、福建吸纳华侨资本的能力等方面。^③后者论述

① 参见徐建国《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② 参见徐建国《民信局与侨批局关系考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③ 参见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印行。

了广东和潮汕地区的侨批业运营状况，阐明了侨批业经营的多种方式，包括兑换方式、卖港单或省单之法、运货抵账以及送现接济等，集中论述了潮汕侨汇“上盘生意”的操作方式，并比较了潮汕侨批业与厦门侨批业经营的差异。^①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侨汇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国家对侨汇工作非常重视，先后组织人员对各地侨批业进行了调查，在资料搜集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形成了一批调查资料，但这批资料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不多，主要有《侨批局利润研究》和《南洋侨汇与美洲侨汇》等。前者详细研究了侨批局在不同时期的利润情况^②；后者则用比较方法详细分析了东南亚与美洲的侨汇机构、侨汇数额和侨汇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③

改革开放后是侨批业研究重新崛起时期，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表现在研究时段延长、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视角多样化等方面。其中《福建批信局述论》一文详细论述了批信局的萌芽时期、逐步发展时期、艰难发展时期、畸形发展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情况，阐明了批信局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形式，肯定了批信局在沟通海内外联系方面所具有的桥梁作用和争取侨汇中的积极作用。^④《潮汕批信局的经营网络》一文详细分析了潮汕批信局经营网络的组成和结构情况。^⑤在关于侨批业的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网络理论、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不断被应用到相关研究中。如滨下武志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合会”和批信局为例，分析华人金融的特点和性质，认为批信局是传统区域社会对外联系的金融组织，其内部组织、经营方法都具有传统社会特征。^⑥戴一峰以20世纪上半叶批信局与中国银行的关系为切入点，详细探讨了批信局与银行之间的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及共生等多重关系，认为把

① 参见姚曾荫编著《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② 参见向阳《侨批局利润研究》，《经济导报周刊》1949年第129期。

③ 参见冯肇伯《南洋侨汇与美洲侨汇》，《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2期。

④ 参见林真《福建批信局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⑤ 参见马明达、黄泽纯《潮汕批信局的经营网络》，《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

⑥ 参见〔日〕滨下武志《传统社会与庶民金融——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合会”与“银信汇兑”》，载《华侨华人历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5》，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85年印行。

“现代”与“传统”简单对立的模式有失偏颇，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非常复杂多样，有合作、互补、融合和共生的一面，传统中也包含许多积极的推进性因素。^① 戴一峰的另一篇文章则运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对批信局组建的影响以及批信局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认为批信局借助社会纽带将自身网络化，并使其商业活动结构性地嵌入华人跨国社会。^② 另外，还有文章从批信局与官办邮局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双方关系的演变。焦建华的一篇文章认为批信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利用遍及各地的分号、商号和杂货店以及邮局、银行等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经营网络。晚清邮政建立后，由于两者存在业务交叉和利益冲突，以国家作后盾的官办邮政采取各种法律和行政手段，通过提高邮资、颁发执照并严格管理、限制批信局的分号设立和信件自带、严厉打击走私等，逐渐打击和排挤批信局，最终确立了官办邮政的垄断地位。^③ 焦建华的另一篇文章论述了1928—1949年官办邮局和批信局之间在进入壁垒、具体业务和走私等方面存在的冲突，由于两者的地位存在很大差异，官办邮局处于垄断地位，在双方竞争中具有极大优势，但批信局作为社会经济组织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对官办邮局进行“规制”，表明可竞争理论的可行性以及社会力量也能对垄断企业进行“规制”，从而可以弥补仅从政府层面规制垄断企业的不足。^④ 凌彦的文章认为晚清邮政诞生后，为维护邮权不断挤压民信局。到民国时期，在国家邮政的强力扩张下，民信局和批信局以走私方式与邮局展开竞争，邮局则以缉私来捍卫国家邮权和邮政利益。民信局的走私和邮政的缉私斗争，反映了国家邮政与民信局关系的一个侧面。邮政对民信局的整合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由弱

① 参见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参见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参见焦建华《竞争与垄断：近代中国邮政业研究——以福建批信局与国营邮局关系为例（1928—1949）》，《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

④ 参见焦建华《中国近代的垄断与“规制”——以福建批信局与国营邮局关系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到强的一个转变。^①但文中的民信局指的是为海外华侨服务的侨批局，而非从事国内各地之间邮件寄递的民信局，作者对此没有进行严格区分。

综合起来看，目前关于民信业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主要原因在于：（1）民信局作为一种民间通信服务组织，不属于国家正式经济组织的范畴，长期以来没有引起重视，一般的邮政史研究把它作为近代官办邮政的对立物或比较物一带而过，缺乏深入探讨，这是民信业研究薄弱的主观原因；（2）由于民信局是民间通信组织，属于民营经济范畴，不但其本身没有系统的资料保存下来，而且由于它不在国家管理范围内，官方也没有系统资料保存下来；（3）对于时人来说，民信局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即使是文人墨客也很少有人对它感兴趣，比如在林则徐、郭松焘等人的日记中，仅仅提及某年某月某日利用某信局寄递信件而已。以上三点说明资料的缺乏，是民信业研究薄弱的客观原因。

第二节 研究对象、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一 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需要做出特别说明。

首先，是关于民信局的名称。当时从事民间邮件寄递的这个服务性行业，并不自称“民信局”或“民局”，而是自称“某某信局”或“某某局”。如“天津市内的民局，几乎有十五六所，冠以各自的家号，挂着写有某某信局的招牌”^②。这在留存下来的实寄封中可以得到证实，如老公利信局、三盛信局、广泰信局、全泰盛轮船局、全泰盛旱道徽州局等。之所以出现“民信局”或“民局”，是在官办邮政出现后，人们为了把两者区分开而使用的名称，“民信局”是作为与“送信官局”相对应的词而出现的。如“闰五月总理衙门拟就通商各口岸设立送信官局，由总税务司管

^① 参见凌彦《民国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关系析论——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 [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侯振彤译，1986年印行，第35页。

理”以及“四年得复，遂于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首先设立送信官局”。^①

其次，关于民信局和侨批局之间的区别。在关于民信局研究的专著或文章中，基本上都分为民信局和侨批局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可以视侨批局为民信局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共同组成了近代中国的民间通信形式。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过去已经有人注意到它们在经营地域、拥有的资本量和经营的业务等方面的差别。如据厦门海关报告，1891年底，本地有23家邮政代办处，其中有8家是侨批局，其业务是发送和接收来自海峡殖民地、泰国、西贡、马尼拉和其他外国口岸的信件，“据说，它们还拥有相当数量的资本，从事厦门与上述地区的贸易和银行业务”。对于从事国内各地之间邮件传递的民信局，“本地有12家信局或信行，办理收发来往各通商口岸的信件等业务”，“它们规模小，没有或几乎没有资本”。^②从不同角度，两者之间都存在较大差异。到民国时期，官办邮政在统一全国邮政的过程中，由于侨批局所具有的特殊性，“惟闽粤一带的侨批局，因与华侨属乡谊关系，寄信汇款可以不写地址、甚至不写姓名，都能安全送交侨眷，邮局无法代替”^③，有允许它继续存在的必要，于是对二者进行了严格区分。1933年12月，国家邮政总局在给各地邮局的通飭中指出：为便于区别，就民局业务性质分别办理：（1）专营国内普通信件者，定名为民信局，不准兼收批信；（2）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者，定名为批信局，不准收寄普通信件。^④这是就两者的业务性质和寄递范围做出的划分，以此作为是否取缔的依据。所以，把侨批局也称为“民信局”，是在此之前未对二者进行区分时包括官方在内对它的通用名称，此后，官方书面语称之为“批信局”，而华侨、侨眷一直称为“侨批局”。

作为本书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必要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对二者进行区分。

① 王桢：《邮政》，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页。

② 秦惠中主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3页。

④ 参见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